

中国最后也是规模最大、变化最快的一次城乡大变迁和财富大洗牌，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将因这场城市化浪潮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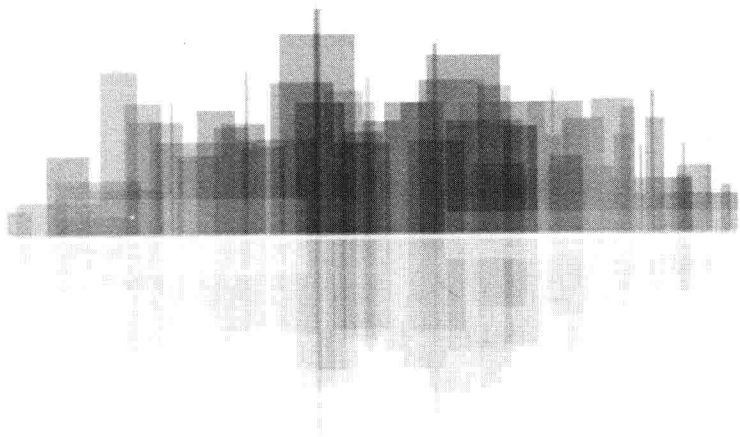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

走出费孝通陷阱

DEATH AND LIFE
CHINESE CITIES

童大焕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

走出费孝通陷阱

DEATH AND LIFE
CHINESE CITIES

童大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走出费孝通陷阱 / 童大焕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5
ISBN 978-7-5060-7539-8

I. ①中… II. ①童…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5246 号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走出费孝通陷阱

(ZHONGGUO CHENGSHI DE SI YU SHENG; ZOU CHU FEIXIAOTONG XIANJING)

作 者：童大焕

责任编辑：徐 玲 袁 园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9.25

字 数：278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539-8

定 价：4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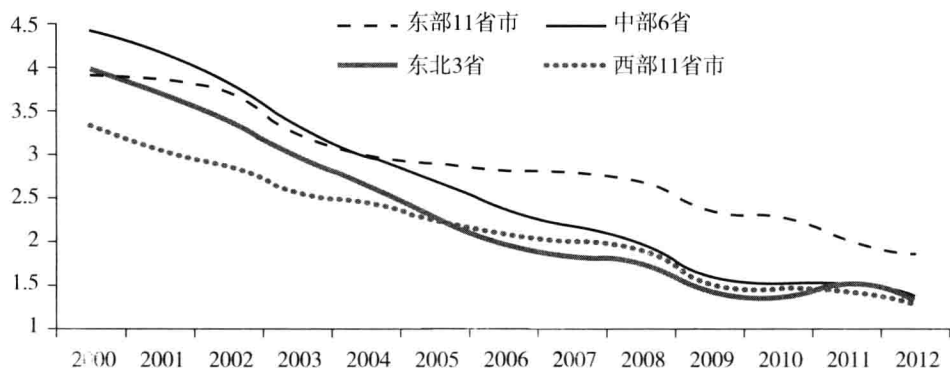
自序一

从 QQ 大数据看中国大城市化潮流势不可挡

早在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就说过：21 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当下中国，朝野上下已经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出于精英阶层对大城市化和所谓“城市病”的恐惧，出于文人思维中理想浪漫化的区域均衡发展乌托邦梦想，出于权力的傲慢与自负，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存在着规律与规划撕裂、人口流动与政府导向背离等现象。它一方面导致人口净流出地区的过度投资和过度城市化，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不把钱当钱，一直在搞小城镇大跃进、西部大开发、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导致人口净流入地区、尤其是流入大城市人口的各项基本自由和权利得不到保障，不把人当人，无视人的自由选择、自由迁徙权利，大城市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收容遣送（已废除）、户籍管制、学籍限制、产业强迁等手段往外“赶人”。

但事实证明以西部大开发和小城镇战略为代表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是失败的。在产出和投入比中，东部一直最高，中部其次，西部和东北一直垫底；在经济发展上，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西部人口也持续外流。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在 2001 年至 2012 年的 11 年中，河南、四川、安徽、贵州、广西等五个中西部省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图文详见李迅雷《城镇化有形之手请手下留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东部和西部省市包括省和直辖市

图1 东、中、西和东北地区 GDP 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

而日前 QQ 基于 8 亿多活跃用户，通过大数据分析首次披露“逃离北上广”数据图。数据显示，2014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1 日，共计 4907 万人从北上广深四城回到全国各地，占四地总用户数的 51%。节后，约 1070 万的人真正逃离了北上广深，逃离率为 11%，其中，北京又以 18% 的逃离率成为人们最想逃离的城市。其余的人选择继续他们的打拼之路，再次离开亲人，义无反顾踏上回归北上广之路。

从 2014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25 日，1994 万用户在 2014 年首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上广深，新增率达到 21%。其中近 7 成是 18 至 29 岁的年轻人，而北京凭借 27% 的涌入率，再次夺冠，成为人们最愿意来此打拼的城市。

解读规律探索规律坚守规律这样的知识求索，比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往往更有意思也更有用，更能知道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大数据是全数据，不带有任何取样的倾向性，也减少了取样的局限性。样本越大，真实准确率越高。有人提出，以 QQ 登录地作为统计根据，统计比例不会太科学，尤其是逃离部分，竞争力下降的中年以上农民未必上 QQ，出于自然规律和制造业萧条考量，这部分人应该才是逃离的主力，而新增部分应该是可信的，年轻人几乎很少不用 QQ 的。

这个分析有道理。也就是说，真正逃离北上广深的实际上不只 11%，而“逃往”北上广深的 21%，则比较接近真实数据。

但考虑到有关部门公布的 2013 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 2114.8 万，上海市常住

人口 2415.15 万，广州估计 1300 万，深圳估计 1100 万左右，合计 6930 万，比 QQ 在这四城市的登录用户总数 ($4907 \div 51\% = 9621$) 还少 2691 万，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多出部分为瞬间流动人口。再考虑到相当比例中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中老年人不上 QQ (这个比例也是确定的，就是 QQ 有 8 亿多活跃用户，全国 13.7 亿人，活跃用户与非活跃用户之比为 8:5.7)，因此我们可以推算，2013 年年底，北上广深四地活跃用户与非活跃用户分别为 9621 万和 6855 万。那么，包含瞬间流动人口在内，北上广深四城市 2013 年年底的实际人口数量并非官方公布的 6930 万，而是高达 1.6476 亿。

考虑到北上广深的城市特点和年龄结构偏年轻的特征，而其余大量待在农村的人口不用 QQ 等，上述人口总数可以作适当修正，那么我们可以估计这四大城市的实际人口应当也在 1.2 亿上下，比官方公布的数据多出近一倍。

这个数据，可以从实际生活中得到些许验证。2013 年某日在一个饭局上，某位生意人说，北京公安的朋友告诉他，北京的人口 (含瞬间流动人口) 实际上已经超过 4000 万。(此处请王思想、王晓阳同志作证)

为什么实际人口 4000 万，但官方数据只有 2100 多万？瞬间流动人口没有计入只是一部分原因 (因为不可能那么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我猜是因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以资源有限理论控制大城市人口，实际人口与他们想控制的人口规模差别太大，将会揭示资源有限理论和人口控制理论的谎言破产。这个理论一破产，再提控制大城市人口就没有依据了，而且因为日积月累积重难返，他们将面临如何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高考等问题的巨大现实压力。

我们再来看“逃往”北上广深的人群。QQ 大数据显示，1994 万用户年后首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上广深四地。请注意，这里不含刚毕业的 700 多万大学生 (学生六七月才离校)，大学生留在这四地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智联招聘根据简历库数据分析显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比例高达 54.1%，毕业三年后在这四大城市就业的更是高达 57.3%。

也就是说，每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新增就业人口将达到 $1994 + 350 = 2344$ 万，而流出人口则近半。这 2344 万是个什么概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2 年至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 1.35 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 2096 万人。(2012 年 8 月 17 日中国新闻网) 也就是说，每年新进入北上

广深四大城市的人口总量超过每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总量。

这样一分析，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就变得很清晰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成为市民的过程，而且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过程。相当多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包括刚洗脚离田的青年农民，都是一步到位先进入大城市，然后其中一半左右的人，经过大城市多年的熬煎与洗礼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再向中小城市分散。而大部分的人，则留在了大城市。QQ 大数据表明，节后未返回北上广深的人群，大部分流向了山东、河南、湖南、安徽以及除广州深圳外的广东其他地区，在家乡附近的二三线城市找到了他们新的天地。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市场规律不听领导和决策的指挥棒，反过来则说明决策不尊重公民自由、不尊重市场规律。如今我们三四线以下城市大跃进已经制造了大量空城，留下了巨额债务，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留下巨大隐患，但我们仍然在意气风发地“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仍然在以大无畏的精神说：“北京人口调控的当务之急是要痛下决心，坚决遏制住人口无序过快增长的势头，要抓好以业控人，坚决淘汰吸引流动人口过多的产业。”

城市化是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大城市化是资源节约、效率提高、人类自由与能量充分施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也是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全球性规律，顺之者繁荣昌盛，逆之者萧条衰败。任何把城市化当成经济增长、“城乡均衡发展”和“疏散大城市人口”的目的，最后都一定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2014 年 3 月 6 日

自序二

走出“费孝通陷阱”

——中国城市化需要重定坐标

我将一如既往，用关注城市化的方式回望乡村，用智力推动城市化的方式回报多灾多难的父老乡亲！一切正如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道格·桑德斯在其堪称伟大的《落脚城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一书中所言：“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也取决于它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经营不善的落脚城市可能把乡村变成一座监狱，经营不善的乡村则可能导致落脚城市失控。”

——题记

未来十亿中国人告别农耕生活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一些人在“仰望星空”期待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顶层设计”；一些人在“脚踏实地”关注和研究发自底层和社会层面的“自发秩序”。在我看来，关注后者的人数远远少于关注前者的。但毫无疑问，“自发秩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远大于“顶层设计”。而当下“自发秩序”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最甚的，莫过于中国最后一波也是最大一波城市化浪潮。在这一浪潮中，十亿以上的中国人将越过重重阻碍和艰难险阻，彻底告别农耕生活，进入更加集约、文明、富裕的城市生活行列。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经城市化而能够进入现代富裕、发达、文明、低碳的国家行列的。当下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等全方位的影响，乃至对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和家庭具体境遇的影响，都将远远大于政治民主化。必须先补上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这一课。没有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政治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有了财产自由、市场自由，政治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正如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2013年11月9日）写的一首打油诗里说的：

“没有市场做基础，欲求民主得民煮。千古悠悠斑斑泪，何以兴亡百姓苦？不从个体自由起，一朝变天总辜负！”

市场权利还市场，法治护航且开路。透过迷霾看前途，自发秩序终有数。何妨笑谈茶杯里，看遍毁誉与沉浮。”

当代中国，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个人解放史，城市化则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筚路蓝缕、离乡背井，将这种个人解放推到极致的奋斗史和血泪史。作为中国最后，也是规模最大、变化最快的一次城乡大变迁和财富大洗牌，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将因这场城市化浪潮而被改变。

但是，由于公民财产权、自由迁徙权等权利的长期缺位，以及“顶层设计”在理想主义指导下的职能错位等原因，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又注定是格外山高水远。放眼望去，是崇山峻岭层层阻拦，只有仔仔细细在荆棘丛中寻找，才会发现那一脉细流，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终于要冲破重重阻力，迂回曲折地冲出大山，奔流到海不复回！

中国深陷于“费孝通陷阱”

一次课堂上，有同学问我：当代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每每背道而驰。

中国的城市化政策逻辑，至今深迷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38年写就的《江村经济》（又名《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一书里。自1978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重启以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战略一直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青睐，甚至几度成为国家基本战略。但时至今日，硕果仅存的也就是距离大

都市圈（群）中心城市百公里范围左右的小城镇，其他大多或因效益不佳、或因环境污染而被迫叫停。

哪怕如今已经是“鬼城”遍地（中小城镇大跃进，房屋供应严重过量导致出现大量无人居住的区域），从政府的政策选择到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设计，依然担心农民进入大城市会导致出现贫民窟，担心他们失去居住尊严，甚至制定政策限制他们进城，尤其是进入超大城市。直到2013年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在坚持基本一贯的主张：“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这一条是1998年开始放开的——大焕注），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将来的事实还将证明，“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场自发选择的“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栋房”“蜗居城市住老鼠窝（地下室）、家里房子给老鼠住”，这种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长远景观。试图用行政力量改变人口流向，不但改变不了大城市化潮流，反而会加剧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资源与财富浪费甚至是移民三代的城市骚乱。

当今国师厉以宁先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范式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理念一脉相承。2013年10月17日，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还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城镇化道路，采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目前我国公布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1%，这种统计方式把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也计算在内，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剔除农村户口，现在全国的城镇化率不到40%。再过几年，中国人口将超过14亿，要达到西方国家80%的城镇化率，将有12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城市。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超过6亿，再往城市里涌入5亿多人，城市里有这么多水、土地和工作岗位可以提供吗？”厉以宁认为，传统城镇化最后带来的是“城市病”，带来了城市中的“反城市化”倾向。今后，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要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采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要进入以新农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社区。只要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新农村就可以由村的管理变为社区管理模式，这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

但是，厉以宁先生又是自相矛盾的。他说，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最佳途径。如果城市没有小微企业，没有民营企业，这个城市只能是“鬼城”。那么，厉以宁先生难道认为小微企业像小农经济一样自给自足（如今已经不能保证基本温饱），而不是服务于城市的其他人群吗？一边说就地城镇化，一边又说要小微企业，没有人口的高度聚集，小微企业为谁服务？“就地城镇化”的人们只为自己服务？

当代主流的“就地城镇化”思潮，更早的思想源头应当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但他所描述的开弦弓村地处江苏省吴江县，如果不是以长三角大都市群为背景，如果不是“东临上海，西濒太湖，南近杭州，北依苏州，古有‘吴根越角’之称”，如果不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之间有吴江”，它的“就地城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979年，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此后，深圳特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由一个落后的小渔村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

1990年4月，江泽民在长三角的浦东画了一个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了开发浦东的决定，此后浦东成为上海经济的引擎，亦被誉为中国三个增长极之一，地区面貌日新月异。而先进的国际物流港口，航空运输、铁路轨道运输、城际高速路共同建构的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体系，使浦东距世界仅“一步之遥”。

2003年，又在河北唐山曹妃甸画了一个380平方公里的圈，配之以首钢整体搬迁。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它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然而大规模地投入建设长达10年之后，这个“圈”却不灵了，曹妃甸陷入“鬼城”风险，平均每天要偿还的利息高达1000万元。

设想一下，如果深圳特区不是以珠三角和香港这个大都市群为依托，如果浦东新区不是以长三角大都市群为背景，而是把这个“圈”画在新疆喀什50公里外，或者画在甘肃酒泉，它们会不会也成为今天的曹妃甸？

厉以宁先生说：“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超过6亿，再往城市涌入5亿多人，城

市里有那么多水、土地和工作岗位可提供吗？”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许可以作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这句话里你看出了什么？我的答案是：1. 三大都市圈未来的人口会让今天许多中国人目瞪口呆，特别是坚持小城镇理想的人们；2. 三大都市圈未来房价会让今天许多人目瞪口呆，特别是以古板的房价收入比来衡量的人们；3. 三大都市群自我创造的就业机会会让许多人目瞪口呆，特别是以为就业岗位需要政府来创造的人们。我要问坚持“就地城镇化”理想的人们：如果“就地”有就业岗位和上升空间，人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自找麻烦到城市？过去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战略已经失败了一次，我们难道还要在十几年后又重蹈覆辙？事实上，人口的高密度聚集本身就是就业岗位源源不断的创造机，而试图依赖政府安排就业的幻想只会酿成悲剧。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计划一切，导致就业岗位锐减，不得不采取知青下乡和计划生育政策，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被迫重启市场化之路。今天，国企占有全国资源总量近半，在13.7亿人口中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过区区6000万左右，央企更是只提供了2900多万个就业岗位。

执着于小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的人们，经常拿宁静、悠闲、空气清新、住房宽敞、经济发达的小城镇为例说事，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包括试图“借道”费孝通的人们，往往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忽视了这些小城镇自身的背景——它们依托的就是大都市，甚至本身就在100公里左右的大都市通勤圈内。离开这个大背景，试图让最广大的农村全都“就地城镇化”，是虚妄；试图用行政力量强行搞“就地城镇化”，就不仅是虚妄，更有可能是悲剧、是灾难了！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任何人都不是傻瓜，难道普通老百姓比学者和决策者更不知道享受小城镇的明月清风高堂大屋吗？偏要到充满灰霾、拥挤不堪的大城市挤地下室？普通百姓又不是受虐狂，偏要自己找罪受。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就地”根本没有就业和上升空间。而在当下中国47%的工业化率对应只有35%的真实城市化率（世界平均水平是26%工业化率对应70%左右城市化率）、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城市化率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率的大背景下，想用小城镇工业带动就业，比十几年前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还要难。并不是住楼房、有公共社区服务和均衡社会保障就叫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还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

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就是人口一定程度的聚集。

退一万步说，试图人为采取大城市化或小城镇化战略，而不顺应、遵从市场规律和人的自由选择、自由迁徙权利，包含了精英阶层致命的自负，以为政府主导的某种一统天下的政策是更高明、更理性的，民众自发自主的选择却是非理性的。其实，政府的理性同样是人为的结果，同样受到人类理性的制约，一旦出错，就是整体出错，损失很大，而且难以纠正。而个人即使出错，也是局部之错，损失较小，而且可以及时得到纠正。

那些宣扬小城镇和农村有种种好处，甚至不惜采取行政手段都要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决策者、学者、舆论鼓吹者，能不能诚实一点，来点实的，既然农村和小城镇那么好，你们自己能不能带个头，离开一线二线城市，举家迁徙，先到农村和小城镇安家立业？否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为为人做事之底线。

当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举成为他的成名作，成为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这篇文章也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从此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但是，后来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特殊的城市地理背景，把它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从而一再陷入“费孝通陷阱”而无法自拔。就像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由于它们特殊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背景而不可复制一样，把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当成一种模式在神州大地四处复制已是一种悲剧，再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梦想去限制人们流入大城市，则注定是一种灾难。

逃离农门者的双重背叛

当代中国城市化第二个严重问题与第一个相辅相成，可谓一枚硬币正反两面。那就是：这一轮城市化浪潮重启已经三十多年了，但进城农民的住房等问题——不论是买房还是租房，从来没有进入过政府视野。尽管多年来舆论汹汹，但大城市白领和中产阶级掌控的媒体，在住房问题上，从一开始就一方面背离了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逻辑，一再呼吁用政府行政力量调控楼市；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刚毕业就集体背叛了他们出身的阶层，无论是买保障房还是购房，考虑的都是城市

下层中产（白领）的承受能力，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向中产晋级的阶梯问题，始终没有被提上媒体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我们高高在上的决策者们，甚至一再试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进城农民挡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之外的决策者、学者和舆论把持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三代以内都是农民，但他们一跳离农门就忘了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做客央视《经济热点面对面》节目时说，“买到房的进城打工农民比例低于0.7%，经常有一句话说，农民工就是老家的房子让老鼠住，自己在城市住老鼠窝。什么时候能在城市买得起房子，孩子能接过来上学，老人也能在城里养老了，农村的土地才能流转出去。”诚哉斯言！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农民土地、房屋的财产权和抵押、担保、流转等权利和自由，而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为12.77亿亩；截至2010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为2.5亿亩。即便不包括农民承包的林地、草地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激活的农村土地至少达15亿亩。有学者因此估计，仅承包耕地一项，每年将撬动1.3万亿元资金；而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可能高达130万亿元。激活土地这一农民最大的资产，必将唤起沉睡的巨量资本，给农民、农村及相关产业带来无穷的想象力。（2013年11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

但一方面，远离城市地区的农民土地、宅基地和房屋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成交价格隔着万水千山；另一方面，如果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定居，是不可能实现生活品质提升以及农村土地、房屋流转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商品化的。前途未定，多数人不会自断后路。而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堪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进城农民与城市有产权房屋之间的距离有若星河般遥远。同时，城市政府也没有为外来移民提供任何包括教育、医疗、公共生活、工作机会等方面的支持。中国城市化有别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都市村庄”“落脚城市”，进城农民再也没有条件“圈了政府的地”；而不被法律正式承认的小产权房，即使房价是中产阶级商品房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由于缺乏正规的金融体系介入，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外来农民工和毕业即失业的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来说，也仍然是一个过于遥远的梦。事实上，购买小产权房的主流人群仍然是城市中产，还有一些贪官用以洗钱——因为它们完全游离在政府的监管视线之外。

世界上“农民圈了政府的地”的落脚城市都能合法化，何况小产权房？现

有小产权房离进城农民还是太远，因为要付全款。如果小产权房合法化，用长远的每年交物业费取代如今一次性 70 年的土地出让金，不仅政府有了稳定的税源，而且因为小产权房合法化后可以按揭，进城农民的购房门槛将大大降低。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最近两部委又紧急通知，坚决遏制小产权房云云，国务院日前也下令停建停售小产权房，可央视《新闻 1+1》说，中国小产权房可能已有 60 多亿平方米，相当于中国房地产近十年的开发总量。诚如马未都所言，“这数字如果属实，百姓就不必担忧，估计只剩下决策者忐忑不安了。按中国的文化传统，法不责众，最终杀几只鸡，给猴看看，多半会不了了之，皆大欢喜了事。”与其如此，不如尽快合法化，农民进城门槛再降低，政府有长期稳定的税收；买房人产权一步到位，由小产权越过大产权，直接进入永久产权。你好我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商品房市场也没有充分考虑高密度、小套型、低总价的适合进城农民的购房需求，这方面几乎是一个完全空白的市场。我们高度防范和害怕人口密集、人均居住空间小的贫民窟。但很多人不知道，只需承认贫民窟房屋的产权，贫民窟外表虽没有改变，实质却一直在不断变化：源源不断的进城移民以此为跳板，川流不息，进来的是贫民，搬出去的是中产，它其实是个化铁为钢，化铁为金的大熔炉。

很多人担心农民进城会不会变成流民。其实，会不会变成流民，主要取决于城市的态度和方式，进城农民有没有入门级有产权住房非常关键。在今天这个按揭和通胀的时代，不能拥有一套独立产权房，中产者迟早会变成穷人，何况原本经济地位更低的农民。现在的城市，用尽办法“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进城农民，廉价占用他们的青春与劳动力，却不想承认他们的市民身份，更不想他们长期定居。但是，第一代进城农民老了回乡，第二代老了回县城，第三代就再也回不去了。乡村回不去，城市进不了，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第三代农民工未来的命运会怎样，中国城市和中国未来的命运差不多就是怎样。此之谓“共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方喜在评论著名社会学者于建嵘小说《父亲是个流氓》时写下这样一段话：

“富贵阶层的金钱、权力追逐战，对于社会当然具有破坏力，但比起由生存压力而生发出的破坏力显然要可控制一些：由生存挣扎滋生出的社会破坏力，是

法律乃至任何暴力机器所无法控制住的，更不用说道德驯化、观念控制了。对于社会的稳定乃至长治久安来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表述，富贵阶层乃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我对向‘下’指向底层的‘启蒙’思路始终有所保留，或许应该有一种向‘上’的反向启蒙，提醒今天的富人贵人们：你们不妨玩你们的金钱、权力游戏，但底线是让底层草民能维持生存而具有一定的安全感，否则游戏是玩不长久的。”

在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上，如果底层农民、进城农民没有上升的途径，只有下坠的空间，甚至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千方百计把他们阻挡在外，等待我们的会是怎样的一种“共业”？

当代农民失去了什么？

一直有一个谬论，说，农民都往城市跑，是因为城市有更好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娱乐等服务与保障设施。但只要你不是浮皮潦草的，只要你稍微深入了解进城农民的生活，会很容易发现，农民进城可以享受上述种种服务与保障的说辞，全是谎言！娱乐消费这些“奢侈品”就不用说了，只说必需品，他们的孩子在故乡留守，教育完全与他们无关；他们住在地下室，生活在没有下水道的城中村；他们的医疗，在备受政府打击的廉价的地下黑诊所；他们进城打工以后，不仅不能“获得”政府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反而被种种社保的区域阻隔所盘剥。

中国由职工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占个人工资比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尽管如此，他们的相应权利还是得不到基本的保障。2013年11月底，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当年累计中断缴社保的人有3800万，占城镇职工参保的一成还多。在2013年9月的中国养老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也曾指出，在人社部做的一项调查中，有23%的工作人口中断了缴费。

中断社保的原因很多，一些不太正规的小微企业为降低成本，逃避为员工交纳社保；还有就是下岗失业人员，个人无力继续承担社保（因为工作时大部分由企业缴纳，个人缴纳部分占比很小）。另一大类就是外来务工人员，随着年龄逐渐增大或者变换工作地点，如果他们没有在同一个地方交够15年的社会保险，根据现有政策，他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中断社保，仅保留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

金和利息回老家；二是根据老家的政策，把现有的保险关系转过去，但社会统筹部分无法转移，只能转移个人账户的资金，还需重新在当地购买社会保险。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社会统筹虽然名字中有“社会”二字，实际上却是100%由企业为员工交纳。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为员工交纳，是因为员工创造了价值，实际上还是员工的应有所得。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一分钱都没有出。不仅一分钱没出，而且在现有政策下，“社会统筹”这一部分不能跟随人的流动而自由转移（除了公职人员的正式调动），这分明就是人口流入地政府一种赤裸裸的“拦路抢劫”。哪儿有“城市福利”的影子？

综上所述，农民进城是因为可以享受更好的社保、医疗、教育、娱乐等服务的说辞，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他们进城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更好的就业和上升机会。甚至于为了更好的就业和上升机会，他们哪怕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哪怕忍受逼仄肮脏的居住环境，哪怕忍受教育、医疗、社保等的不公平，哪怕娱乐生活乃至个人性生活缺失，也在所不惜。为什么连个人性生活也会缺失？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其中一方被迫留在故乡抚养孩子）；另一方面，即使有不少夫妻双双进城，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独立租住房屋，而是为了省钱，采取与工友合租的方式，这势必也要以牺牲正常的夫妻生活为代价。

因此，很多人，包括国师厉以宁先生都认为，“只要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新农村就可以由村的管理变为社区管理模式，这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这种想法，颇有点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之“古风”。农民进城要的不是公共服务，而是就业和上升机会，农村有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了，农村就业岗位就自然产生了？

向城市要就业还是向农村要就业？这是一个纠结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也祸害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且至今仍在祸害中国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当成了就业之母。1949年到1978年间，城市是雷池，农民不得越雷池半步。知青下乡，农民不得进城。结果，过度开垦等导致土地沙化面积增加了300多万平方公里，“3年自然灾害”农民饿死3700多万，知青暴动也要回城。

时至今日，面对农民进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几乎不假思索常问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农民进城靠什么就业？而几乎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留